

東正教傳教士與中國文化西漸的北方之路

Orthodox Eastern Church Priest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along the Northern Route

白嗣宏 (Bay Sykhun) *

一、東正教來華 270 年 (1685-1954)

東正教 (或稱正教) 於 10 世紀傳入俄國，成為俄羅斯主要的宗教，俄國歷代沙皇均信奉東正教。到了 17 世紀中葉，俄國向東擴張到遠東太平洋和黑龍江 (俄稱阿穆爾河) 地區，清朝康熙皇帝派軍前往東北黑龍江邊疆，阻止俄國「紅鬍子」 (又稱羅刹) 的騷擾。1671 年開始攻打雅克薩 (俄稱阿巴津)，在 1685 年的戰役中，清軍俘獲 100 多名俄人，其中有哥薩克、農民和市民，康熙下令將俄國俘虜帶回北京。康熙對這些俘虜相當寬容，對他們的軍事訓練表示讚賞，並將其編入正黃旗，稱作「俄國百人團」。康熙恩賜他們在北京東北城外居住 (現俄國大使館所在地區)，並將充公的婦女配給他們作妻子。阿巴津的東正教神父馬克西姆¹被俄國俘虜強行帶來中國，在這些俄國人中間進行佈道活動。在北京定居的俄國人通過來北京做生意的俄商，請求西伯利亞政府派神父來接替年已耄耋的馬克西姆。1712 年，康熙表示同意俄國派東正教使團來華，並希望派一名皮膚科醫生隨同前來。俄國彼得大帝基於向遠東擴張的需要，同時希望通過傳教說服清帝和中國百姓改信東正教，決定派遣使團前來中國傳教並派學生前來北京學習漢文、滿文、蒙文及其它東方語言，研究中國的風俗和文化。第一個使團於 1715 年底 1716 年初到達北京。

康熙接見後，恩賜團長五品頂戴和年祿 800 兩。以下人等均有賞賜。1727 年中俄恰克圖條約第五條又詳細規定了東正教北京使團的地位、成員、供給、居留地。自此東正教使團得以在中國活動 200 餘年，直到 1954 年，先後共 20 屆。除北京外，還在中國其他一些城市開設東正教教堂，從事傳教活動和研究中國。

二、把中國文化帶向西方的俄國漢學家

俄國政府通過設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開始同中國直接交往。教團歸俄國外交部領導。由於清政府早期採取閉關政策，沒有同外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西方諸國往往通過傳教士進行聯繫和研究中國。彼得大帝在獲得康熙皇帝同意後，派教團來華，承擔起三重任務，即傳教、外交、研究。本文側重探討東正教使團在研究中國、介紹中國文化方面的活動。

據尼古拉修士大司祭²所撰《北京教團早期活動史 (1685-1745)》稱，北京教團在一段時期內成了聯結中俄兩國的紐帶。教團裡有俄國留學生，「是俄國唯一培養通曉漢文和滿文人才的機構。他們日後成了俄國第一批駐遠東的領事官。其次，到本世紀 70 年代 (指 19 世紀) 末，教團還是政府獲取中國資料和研究這個鮮為人知的國家各個方面的良好機構。最後，中國人不會擬寫俄文公文，於是教團教中國人學俄文。例如，中國政

* 作者現為莫斯科國際工商科學院教授。

1 馬克西姆神父，姓列昂節耶夫 (Максим Леонтьев, ?-1712)，1685-1686 年間，經康熙批准，前來北京傳教，直至 1712 年在北京去世。馬克西姆神父的傳教活動得到彼得大帝和東正教領導的高度評價。

2 尼古拉修士大司祭 (姓阿多拉茨基，Николай Адоратский)，第 16 屆和第 17 屆教團成員。著有《北京教團早期活動史 (1685-1745)》*История Пекин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рвый период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1685-1745)。

府自願派教師教我們教團中的世俗成員，然後請這些成員翻譯和審閱從俄國發來北京的全部公文，以及從歐洲發來給基督教傳教士的公文。此外，並委託東正教使團成員和團長教授大批中國少年學習俄文。」³教團在華搜集了大批資料並運回俄國。據Dudgeon J. 在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Peking, 1872*⁴ 一書中說，當時俄國外交部亞洲司、皇家科學院、公共圖書館和聖正教院的檔案庫及圖書館，都藏有大量涉及中國歷史、法律、管理、宗教、醫學、植物學、地理學、天文學等的手抄本和作品。

東正教使團在華活動 270 年，培養出一大批漢學家，建立了俄國的漢學。這些漢學家從學習漢文和教授俄文開始，培養懂漢文的俄國人和懂俄文的中國人，編寫辭典，作為可以開展交流的人員和工具。他們向俄國政府和民間介紹中國國情，進一步翻譯中國典籍，研究中國文化。1740 年正教使團編寫的俄拉漢滿四語辭典出版。這部空前的多語辭典，為中國文化西漸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東正教使團出身的著名漢學家有第 9 屆團長亞金夫神父、第 12 屆使團成員華西利耶夫神父、第 15 屆團長帕拉吉神父及第 18 屆團長伊諾肯吉大主教。他們翻譯中國典籍，撰寫有關中國的論文，為中國文化西漸做出很大的貢獻。

亞金夫神父（Иакинф,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1777-1853, 俗家姓畢丘林Бичурин），楚瓦什人，出身神職人員家庭，畢業於喀山神學校，學習拉丁文、希臘文、法文。1807 年被任命為第 9 屆（1807-1821）東正教駐華使團團長，1808 年到達北京。第一件事就是學習漢文和滿文，同時學習蒙文、藏文和朝鮮文。當時學漢文的難處在於沒有俄國人可以看得懂的漢文教科書和俄漢辭典。他花了四年時間，參考《康熙字典》編成第一部漢俄辭典。他在編著《漢俄辭典》時，特別強調介紹中國的文化。他寫道：「我們至今沒有一本像樣的漢俄辭典。我是這樣編中文辭典的：先買下各種礦石、植物、動物，

不知道的東西都買實物，或者模型。然後學各種手藝。一切都要親眼看一看，瞭解每個字的意義和用法。去年搜集了一大批鳥、樹、花草，在住房附近開闢了一座植物園。另外還收集字彙和其他方面的中國圖書。我的辭典在註譯時還扼要描述各種動植物，各種宗教及其儀式，各種法律和風俗，各種藝術和工具。」⁵他在華 13 年期間，大量閱讀中國典籍，研究《通鑒綱目》；除編著《漢俄辭典》外，還編有多語辭典《三合便覽》（滿蒙漢）；在任期間還建議俄國政府派遣自然科學、藝術、文化界人士來華學習和進行研究工作。1822 年他回到俄國首都聖彼得堡，為首都的公共圖書館和伊爾庫茨克的東方語言學校運回 400 普特（6400 多公斤）珍貴的中文圖書。1828 年當選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1837 年當選為巴黎亞洲學會會員。他創建了自己獨特的漢語教學體系，譯出的中國典籍有《通鑒綱目》、《明史》、《四書》、《三字經》，編寫了《北京志》、《蒙古志》、《西藏志》、《西藏青海史》、《蒙古例律》等書。他的許多著作譯為歐洲文字。俄國外交部曾把他的一些漢學著作贈予巴黎亞洲學會和倫敦亞洲學會。歐洲漢學界高度評價他的學術成就。作為俄國漢學的奠基人，他在中國文化西漸史中佔了重要的地位。

華西利耶夫神父（Василье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18-1890）是派駐第 12 屆（1840-1850）使團的漢學家。他於 1840 年到北京東正教使團學習梵文、漢文、蒙文、滿文。1851 年任大學教授，研究範圍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語言、文學、宗教。他的專著《佛教及其教義、歷史和文獻》，影響很大，被譯成德文和法文。《東方宗教：儒教、佛教、道教》、《漢字分析》、《伊斯蘭在華流傳記》，向俄國和歐洲介紹中國的宗教文化。1896 年當選為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帕拉吉神父（Паладий, Пётр Иванович, 1817-1878, 俗家姓卡法羅夫Кафаров，神職為修士大司祭），12 屆（1839-1850）使團成員，曾任 13 屆（1850-1858）、15 屆（1864-1878）使團團長，1840 年到華，先後在華 30 年。在華期間，他的漢文老師是一位舉人。他編的《漢

3 同上，頁 23。

4 見該書，頁 2。

5 見《俄羅斯帝國外交檔案》，存彼得堡總檔案館，第 4 檔，第 4 卷，123 宗，1810 年，第 1 件，頁 82。

俄辭典》成為日後俄漢雙語辭典的基礎。他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歷史和宗教文化的論文：《早期中國佛教學說歷史割記》（*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о раннем учении буддизма в Китае*）、《中國伊斯蘭文獻》（*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ламу в Китае*）、《菩薩傳》（*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ы*）、《聖僧簡傳》（*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их святых*）等。他還出版討論中國問題的《彙報》（*Собрание*），對傳播中國文化有很重要的貢獻。

伊諾肯吉大主教（Иннокентий, Иоанн Алолонович 1863-1931，俗家姓菲古羅夫斯基 Фигуровский），畢業於彼得堡神學院，1896年起任第18屆（1896-1931）使團團長。在華35年（1897-1931），主要從事傳教工作。他主持的北京聖主升天修道院印刷廠出版《漢俄大辭典》（*Полный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收漢字16,845個，收詞15萬多個，其中有許多中國古籍和當時口語詞彙，對研究和翻譯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中國文學及漢語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三、中國文化對俄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衝擊

19世紀中葉，俄國思想界發生過一場關於俄國該走哪條道路的爭論。西歐派主張走西歐的民主化發展道

路，主張解放農奴和廢止獨裁體制。斯拉夫派則認為俄國有自己的特點，如宗法制度、保守性、東正教，與西歐派不同，主張走俄國獨特的發展道路，發揚古代俄羅斯的社會制度和農民村社。在這場爭論中，涉及到對亞洲文明及對中國文明的看法。在西歐派眼中，「中國主義」、「中國作風」是落後、保守、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的象徵，亞洲成了野蠻的代名詞。他們把匈奴與成吉思汗帶給歐洲的破壞同亞洲文化混為一談，往往把中國當成獵奇的對象。畢丘林在這場爭論中，通過各種渠道把中國文化的精神實質介紹給俄國思想界。他參加彼得堡一些沙龍，特別是作家和評論家弗拉基米爾·奧多耶夫斯基公爵⁶沙龍的「文學星期六」活動，同俄國作家普希金⁷、克雷洛夫⁸、帕納耶夫⁹、評論及思想家別林斯基¹⁰經常進行交流。畢丘林還在許多俄國雜誌上發表文章，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刊登他文章的俄國雜誌如《莫斯科導報》¹¹、《祖國紀事》¹²、《現代人》¹³等都是當時的權威刊物。他向俄國讀者介紹中國豐富的精神文化、治國之道、道德觀與倫理學，中國的農業、教育，甚至「中國皇帝每日的功課」。這一切都給俄國乃至歐洲的思想界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英法德各國的漢學界都高度評價他的學術著作並譯成西歐文字。德國漢學家克拉普羅德¹⁴是畢丘林的崇拜者，他認為畢氏一個人做的工作相當於整整一個學會的工作。英國作家

6 Одое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1803/04?-1869),出身名門望族,公爵,作家、音樂評論家。曾任哲學學會會長。著有短篇小說和哲學談話集《俄羅斯之夜》等。

7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俄國作家、詩人,著有詩體小說《葉夫根尼·奧涅金》等。

8 Крылов,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1769-1844),俄國寓言作家,彼得堡科學院院士。

9 Панаев,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812-1862),俄國作家,雜誌編輯,主持享有盛名的文藝沙龍。

10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俄國思想家、文藝評論家、政論家。

11 《莫斯科導報》（*Моск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27-1830年莫斯科出版的雙周刊，主編為著名編輯包哥廷（М.П.Погодин），鼓吹德國浪漫主義美學。普希金一些重要作品的片斷曾在這份雜誌上首先發表。

12 《祖國紀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1839-1884年間彼得堡出版的學術和文學月刊，1859年起增加政治內容。俄國許多著名作家和評論家、政論家，如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杜斯妥耶夫斯基、赫爾岑、涅克拉索夫等均在這份刊物上發表文章。這份刊物的精神領袖是俄國著名民主派評論家及思想家別林斯基。

13 《現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1836年由普希金創辦的刊物。普希金逝世後由普列特尼奧夫接辦，後來轉入涅克拉索夫和帕納耶夫手中。俄國許多名著發表於此。普希金的許多重要作品，如《上尉的女兒》、《青銅騎士》；果戈理的《鼻子》；赫爾岑的《誰之罪》；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岡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托爾斯泰的《童年》和《少年》；車爾尼舍夫斯基的《怎麼辦》等。

14 Henry Klaprot (生卒待查),德國東方學家,旅行家。

喬治 巴婁¹⁵ 師從畢丘林學習中文。

畢丘林的學術活動引起奧多耶夫斯基的創作遐想，寫下了一部著名的烏托邦小說《4338年》。

奧多耶夫斯基受到畢丘林介紹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把人類前途的思考同中國聯繫在一起，認為世界的未來對各國人民來說，都是光明的、幸福的。社會應當樹立理智與和諧的思想，各國學者應當是宣傳人類思想成果的戰友，應當為大眾的命運負責。膚色和人種不應妨礙人類交流。未來的中國擺脫了封建束縛，成了新的理想國。奧多耶夫斯基正是從畢丘林口中的中國形象出發，發揮自己的藝術想像力。

《4338年》是用當時流行的書信體寫成。1837年開始寫作，1840年由《晨霞》（*Заря*）雜誌發表片斷，1926年才由蘇聯《星火》（*Огонёк*）¹⁶ 周刊全文發表。故事寫的是居住在彼得堡取了俄國名字的中國人伊波利特 宗蘇耶夫，「北京主要學校的大學生」，寫信給北京的同窗林金，敘述他在彼得堡的生活。寫到他雖然是黃皮膚，但是受到各界尊重，沒有種族歧視，反而很受上層社會女士們的青睞。因為他作為中國人，學問淵博，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歷史、考古、化學、飛行，醫學，無所不知。他寫信告訴林金，另外一個星球維埃拉要衝撞地球，俄國學者建議中俄學者聯合起來共同對付。作者把中俄看成是同盟國家；中俄兩國人民互相尊重，互相愛護；中俄兩國學者交流學問，俄國太空人把技術傳給中國同行。針對畢丘林用了8個月的時間才從北京回到彼得堡，奧多耶夫斯基在書中幻想用電氣球，只花8天時間就可以從北京飛到彼得堡。到了44世紀，中俄已經有正常的定期鐵路交通和飛機航班。

奧多耶夫斯基眼中的中國，同西歐派對中國的看法大相逕庭，當是畢丘林在他的沙龍裡不斷介紹中國文化與哲學思想的結果。

普希金是畢丘林的好朋友。他在自己主編的《現代人》雜誌上發表《好速傳》的片斷，目的是要打破當時俄國文化界以歐洲為中心，把非洲與亞洲視為同樣落後大陸的陳舊觀點。普希金在《葉夫根尼 奧涅金》的第一章手稿中有一段詩：

中國的智者
孔夫子
教導我們尊重青春

這三行詩沒有進入最終版本，但說明畢丘林與他的交流，已轉化為創作的成果。普希金就是在這位漢學家的鼓動下，向政府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他要親眼看一看中國人，中國的風光，他相信中國會給他帶來新的創作靈感。他的私人藏書中有中國史和中國哲學的書籍，從側面證實他對中國的人文興趣，不是一時的衝動。普希金主持的《文學報》（*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¹⁷ 在1830年元旦專號評論說：「人之初性本善、孟母教子、人要進行道德修養、外部條件影響人的命運、關於仁、育的思想，在俄國思想界引起熱烈反響」。《三字經》俄譯文發表後，莫斯科四家報刊同時發表評論，認為這是一部反映中國古典哲學思想的百科全書。《莫斯科電訊報》（*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¹⁸ 在畢丘林的協助下，發表中國文獻和介紹中國文化的文章，樹立尊重中國文化的態度。

俄國思想家車爾尼雪夫斯基¹⁹ 說：「中國人和我們源出同樣的祖先。他們不是特別的一類人，而是和我們完全一類的人。我們在中國人身上看到的特點，不是中國人的特點，而是這個歷史狀態和社會形態的人們共同的品質。」²⁰ 他是在瞭解中國文化之後做出這樣論斷的。

俄國思想家別林斯基從畢丘林介紹的中國命運裏看到俄國的影子。沙皇的檢查官允許批評中國官僚的腐敗，別林斯基含沙射影，借之評說俄國的現實，指出必

15 George Barrow (生卒待查)，英國作家，旅行家。

16 《星火》周刊是1923年創刊的蘇聯社會政治和文藝周刊，圖文並茂；《星火》副刊經常發表文藝作品，至今仍在出版。

17 《文學報》（*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830年1月1日至1831年6月30日在彼得堡出版的五日刊，曾發表俄國名作家普希金和果戈理，歐洲名作家司各特、霍夫曼、梅裏美、斯湯達和雨果的作品；此外還刊登一系列評論文章。

18 《莫斯科電訊報》（*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1825-1834年間在莫斯科出版的文學和學術性雙周刊，由H. A. 波列沃伊主編。普希金曾在此發表作品，後被沙皇尼古拉一世查封。

19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國哲學家，作家，文藝文藝評論家。

20 見《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莫斯科，1939-1953年版，第10卷，頁822-824。

須同農奴制和獨裁作鬥爭。俄國讀者從別林斯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批評現政的觀點。同時，別林斯基也批評了畢丘林美化中國封建統治的觀點，批評他說清政府是人民掌權的好形式、說清政府獨裁政權受法律限制、說四千年的錘煉已經使中國政權接近人民管理的真正原則，這些觀點其實是錯誤的²¹。

托翁²²更有一段有關中國的佳話。他年輕時差一點到中國擔任炮兵教官。當時中國政府聘請俄國軍事專家來華訓練軍隊。托翁作為塞瓦斯托波爾戰役的炮兵軍官，也收到了這樣的邀請。托翁曾寫道：「克利米亞戰爭結束後，派人到中國去。一位朋友勸我去當炮兵指導。我記得我猶豫了很久。」80年代，他曾想學習中文。1891年，他說中國哲學家孔子和孟子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老子的影響極大」。他透過俄、英、法、德四國文字研究中國哲學，並寫過像《中國學說簡述》這樣的文章。

中國文化衝擊俄國思想界、文化界是中國文化全球意義的明證，也是中國文化西進的明證。

四、北方之路

拉脫維亞漢學家彼得·施米特（Peter Schmidt, 1869-1938）的足跡可以說是中國文化西漸北方之路的具象。彼得堡大學畢業後，他於1896年到中國留學。1898年5月起在京師大學堂教授俄文。留學結束後，他婉拒校方挽留繼續擔任俄文教授的工作，經過滿洲地區前往海參威擔任東方學院院長。然後他經過蒙古到達西伯利亞考察，然後到阿爾泰地區、莫斯科、彼得堡，回到拉脫維亞，1920年起擔任拉脫維亞大學教授，教

授中文、滿文、歷史、民間文學、民族學、語言學。他的碩士論文是《北京話文法》（1902）。他根據自己對中文四聲音韻的研究成果，進一步研究拉脫維亞語的聲韻。原來聲韻在拉脫維亞語中，同中文一樣也有含義。他提出中國文化是全球統一文化歷史綜合體的一部分。他在拉脫維亞大學任教期間曾多次訪問歐洲，進行漢學方面的交流。這樣他帶著中國文化走了中國北京、滿洲、海參威、蒙古、西伯利亞、阿爾泰、俄國中部、波羅的海、西歐這樣一條西漸的北方之路。目前拉脫維亞大學仍存著他帶回來的大量中國書籍，包括許多木版圖書，都有待研究。

俄國漢學在歐洲以自己的獨特觀點、深厚功底、第一手材料受到歡迎。俄國與法國的漢學家，早在1728年恰克圖條約簽訂後就開始接觸。法國漢學的形成受到俄國漢學的明顯影響。1734年，俄國東正教駐北京使團的安東尼修士大司祭²³（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 普拉特科夫斯基）從北京向巴黎寄出自己編寫的《漢拉辭典》，很受法國同行稱讚。法國傳教士戈比爾從北京寫信給巴黎同行，介紹俄國漢學家在北京研究中文的情況。1827年巴黎出版俄國旅行家吉姆科夫斯基²⁴寫的《1820-1821年經蒙古到中國之旅》一書（原書於1824年在彼得堡出版），引起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興趣。東正教使團隨團天文學家、外交家、漢學家斯卡奇科夫²⁵1858年日記寫道：「3月25日晚在屠格涅夫家，一大批人在座，熱烈爭論中國問題。主人和女主人支援我的看法。」他在法國同當地漢學界交流學術，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研究館藏手抄本和古版圖書，參加法國漢學家儒利揚²⁶領導的法國科學院漢學中心的研究工作。儒利揚透過與俄國科學院交流圖書和著作，進行學術合

21 見《別林斯基全集》，彼得格勒，1917年版，第11卷，頁155-157。

22 Толстой,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10)，俄國作家，著有《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小說。

23 Антоний Платковский (生年待查，歿於1746年)，第二屆使團（1729-1735）團長。

24 Тимковский, Егор Фёдорович (生卒不詳)，俄國外交部亞洲司二處處長，所著三卷本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1820-1821* 一書於1825年在聖彼得堡出版。

25 Скачков,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анович (1821-1883)，受俄國天文學會委託，前往中國協助建立天文臺。他曾經到過北京、天津、新疆等地，做過駐天津和新疆領事。他對中國文化有著強烈的感情，結交大批中國文化人，為傳播中國文化作出了很大貢獻。在華期間他搜集了大量中國圖書，包括手抄本和刻本，不斷運回俄國。單手抄本約400部。他攜帶回俄國的清抄本長篇小說《故妄言》在中國已經失傳。後由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教授在莫斯科列寧圖書館手稿部發現，並在臺灣出版。

作。俄國科學院把從中國運來的漢、滿、藏、蒙文古版書和手抄本寄到法國，法國漢學家再把根據這些原始材料研究的成果寄回俄國科學院。所以我們說，中國文化西漸也走北方之路這個命題，是有充分根據的。

中國文化的西漸，通過義大利、法國、英國等國漢學家的推動，走的是南方之路。南方漢學家有著濃厚的歐洲文化中心論，影響他們正確對待中國文化；北方漢學家佔有地利，處於東西方文化交叉之地，對中國文化

另有一番看法。北方之路研究不足，一是因為蘇聯漢學界在意識形態的支配下，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俄國文化如何影響中國文化，而對中俄文化的互動研究很少。二是我們對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互動研究不足，至今仍有不少空白。至於流失海外的大量中國文化典籍，像畢丘林帶回俄國的6,000公斤圖書，斯卡奇科夫運回的400多部抄本，包括在中國已經失傳的資料，都值得作進一步的開發。

Research Grant Applications under the Program to Assist Foreign Scholars in Chinese Studies

A direct round-trip ticket between the domicile of grant recipients and Taipei is provided; monthly grants are award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scale:

Full Professor	NT\$ 60, 000	Associate Professor	NT\$ 50, 000
----------------	--------------	---------------------	--------------

Assistant Professor	NT\$ 40, 000	Doctoral Candidate	NT\$ 30, 000
---------------------	--------------	--------------------	--------------

Accidental death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of NT\$1 mill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for up to NT\$50,000 in the case of an injury) will be provided for the grant tenure.

Grants are awarded for between three months and one year.

Applicants should submit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 1) Application form
- 2) Curriculum vitae (including a list of publications)
- 3) Research plan
- 4) At least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Deadline for applications is May 31 of each year.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contact us at: Liaison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 Chungshan South Road, Taipei, Taiwan 10001, R.O.C.

Tel: 886-2-2314-7321 Fax: 886-2-2371-2126

E-mail: ccsgrant@msg.ncl.edu.tw <http://ccs.ncl.edu.tw>